

林语堂 著

中国新闻舆论史

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

今天不少人谈中国的「公共空间」问题，此书仍有可以借鉴之处，因为近几十年关于报业史的专题研究虽增加了不少，却仍然没有一部英文的通论取它而代之。

——余英时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闻舆论史

一部关于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

林语堂 著 刘小磊 译 冯克利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闻舆论史 / 林语堂著; 刘小磊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SBN 978-7-208-08098-0

I. 中… II. ①林…②刘…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6146 号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张 布



世纪文景

中国新闻舆论史
林语堂 著
刘小磊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42,000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98-0/G·1271
定价 25.00 元

序

林语堂是我国现代文坛的巨子，影响中外。1936年8月，他携眷赴美定居，带走的是上海文坛对他鼓吹幽默、性灵，提倡“帮闲文学”，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严厉批判；而留下来的却是默默写成的痛击国民党政权对舆论残酷压制的政策，激励民众为新闻自由、为公民权利而战的论著：这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林语堂自称是“一团矛盾”，这一著作的出现，更把这团矛盾推向一个高峰。

本书的思想内容、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是人们的关注所在。同时，它又是剖解、认识作者身上种种矛盾的珍贵文本。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双重价值。

岁月悠悠，在风云激荡中悄悄逝去。本著问世已逾七十年，新中国成立也近六十年了。名震一时的林语堂及其论著渐渐被人淡忘。1949年以后，我们只看到两篇评析林著的专文（侯东阳：“林语堂的新闻舆论观——

评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2月；王海、何洪亮：“中国古代舆情的历史考察——从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说起”，《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2月），我国新闻史学界读过本著的，也甚寥寥。欣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学界兴起了研究林语堂的热潮，关注林著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期间，译者译出该书，并邀我为之写序。我不禁为之心动，欣然应命。自量有关知识浮泛，根基不深，恐难胜任。但这确是我志趣所在，自当奋力而为，并把此作为学术上探索、磨炼的良机。差误之处，尚恳同行和读者多加指正。

对本书写作主旨的辨析

关于本书的主旨问题，作者在文中已提及，但未着意阐释。我感到尚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辨析清楚，才能使这一主旨成为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思想，统率全书。应作辨析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分述如下：

一是关于本书的科学属性问题。书名是《中国新闻舆论史》，看起来既是“新闻史”又是“舆论史”，二者是并行关系，书中也有某些并行的史料。但实质上本书是舆论史，不是新闻史。有关新闻史的内容总体上是为服务于舆论史而存在的，与后者是附从关系，没有独立存在的地位。本书所以特别看重新闻史，是因为“报刊业是公众的耳目喉舌”^{〔1〕}，和舆论史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具体说，就是与新闻自由的关系。本书一开头就明白地说：“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把新闻自由看做民主的真正基

石。”^[2]又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3]

基于这种观念，本书对中国古代报纸不感兴趣，因为它“主要刊登官员的任免、升迁消息，一般只在官员中流通。因此它远未能成为民众的‘耳目喉舌’，也不是舆论的载体”^[4]。这样，在古代时期这部分，极大篇幅写的是舆论史。除一处有“邸报”一词外，全然不提古代报纸。另也有很小篇幅写新闻史，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报纸发展概况方面的知识。作者自称，这些知识“谈不上有多重要”^[5]。

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关注就不同了。这部分写的几乎都是新闻事业的活动，但要注意，在总体上它是为反映公众舆论与政府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主从关系十分明显。实质上，写的还是中国舆论史。

在本书的最后一段中，作者称：我“写了这本《中国新闻与舆论史》，对漫长的中国舆论史作一次回顾”。^[6]在这里，作者已坦然声称这本书写的是中国舆论史了。

其二，严格地说，本书并非学术性著作，而是政论性著作。学术性论著，通常重在对所研究对象系统知识、学理的提供，也注意实际运用，但还是意在说明前者。这里不妨与台湾学者朱传誉的同类著作《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7]作一对照。朱著一开头就以60余页的篇幅，对新闻自由的渊源、理论基础、基本概念、流派意见等问题详加介绍。而本书对此毫无兴趣，全不涉及。又如，关于宋代部分，朱著写了65页，其中52页是介绍当时与言论出版自由相关的种种知识，只有5页评介当时影响强大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学生运动”。本书则与此大异，全部篇幅（12页）都集中到一

点——评述南宋的“学生请愿”运动。经此对照，林著之非学术性而政论性，似已很清楚了。

林著之非严格性学术著作，还表现在对学术研究规范的违犯。例如，按时代写史，应把握各代前后相承的关系，使其形成相互联系的总体。可是本书的古代部分，在魏晋之后，接下去写的却是宋朝。唐代未作任何说明就被跳过去了。又，明朝写完后忽然刹车，二百余年清代部分不见了。更为严重的是对史料的态度。历史研究，史料是基础。可是本书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订，很不重视，未花力气。所用史料大多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前人之作和刊载于当时报刊上的现成材料。戈氏错了的，林著照错不误，还起而为戈氏的错误辩护。所引当时报刊上的材料，也常出现错误。例如，根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年鉴》，说该年度四川出版报纸29种，实际上当时该省仅日报就49种，对其他省份报纸的统计，也有差错^[8]。所幸这些差错尚未对本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对这些差错曾进行较为严厉的批评。后经反思，感到作者当时的任务十分繁重，时间紧迫，实无暇对这些史料详加考订，出现这些差误，应予体谅。

这里所说本著的政论性，主要是指它无意于泛泛而谈一些学理性、知识性的问题，而是面向现实的政治大局，从大量生动的事实中，揭示公众和专制统治斗争中所出现的矛盾，抒发己见，影响群众。它对现实斗争所起的重大作用，则非《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等类学术著作所可企及。行文生动流畅，平易近人，笔锋常富感情，别具魅力。

其三，关于对国民党政权舆论专制的斗争在本书中所处地位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本书对该政权不是一般性的批判，而是把它作为我国历史上

罕见的范例来对待的。断言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190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差”^[9]，其新闻事业“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引者按：指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之路”^[10]。并以特大篇幅^[11]，对这十年的表现详加剖析。可以看出，它是全书最为醒目的重心所在。

尤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还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以之与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政策进行斗争，作为写作本书的用意所在。这不仅在多处时有流露，而且还坦率陈词，向读者明白讲清楚。如在“宋朝的学生请愿”这部分中，作者宣称：“我们之所以对这一时期特别感兴趣，是因当时的政局、士人的运动和舆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局面。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它教我们以史为鉴，从过去中看到现在。”^[12]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还专作说明，强调他之所以写这部书，是非常“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敦促“今天，我们必须为新闻自由的宪法原则而战，为作为原则的个人的公民权利而战”^[13]。语重情长，传达了自己的心声。这样，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辨析，本书的写作主旨就很清楚了。

对林语堂在上海文坛种种矛盾的解读

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团矛盾，主要是在上海文坛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本书中，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深恶痛绝，号召公众为争取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不懈战斗；可是在社会实践中，他却日益脱离现实

的政治斗争，渐行渐远。正是这一根本性矛盾带动了他身上的另一些矛盾，如文学领域同流派之间的矛盾、文坛上与当年并肩战斗的文化人之间的矛盾、在自己心灵上所凝积起来的沉重的精神矛盾……

首先要解读的就是这一根本性矛盾。这需要对他近十年的经历进行审视。经过查考后我领悟到，他之从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群众性运动，转而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可说是从1927年7月“宁汉合流”建立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开始的。这是一个带有某种规律性的发展过程：林语堂脱离政治斗争的程度，大体上是和国民党政府实施专制政策的程度相吻合，其他矛盾发展状况也大致与此相适应。

林语堂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崇奉西方民主主义，非常赞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纲领，对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持友好态度。特别让他兴奋的是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认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14]。他当时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可是风云突变，美好的期望，顿成泡影。前路迷茫，他一下子消沉了，高昂的政治斗争热情隐退了。

起初，他和上海革命文坛仍保持一定的联系，《语丝》自北平迁沪由鲁迅主编后，林积极为该刊写稿，同时还在鲁迅在沪创办的《奔流》杂志和由鲁迅主持的朝花社所出的《朝花周刊》上发表文章，和鲁迅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

可是到了1930年初，《语丝》等刊物停刊后^[15]，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林语堂和上海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联系忽告中断。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一批革命文化期刊在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拼搏中活跃起来。林语堂却是一位冷眼旁观者，不曾给这些刊物（包

括鲁迅主编的)写过稿子,自己也没有办刊物发表文章。默默地在矛盾中徘徊,度过了近三年的岁月。他自己也用一种打趣的语调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三年之久。”^[16]1932年9月16日,《论语》半月刊创刊,宣告了这一阶段的结束。

这近三年的岁月,可说是林语堂的矛盾生成、演化期。这期间出现了一些对林起着重大影响的政治局势,诸如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妥协投降、对民众残酷镇压本性的显露,对公众舆论大“围剿”政策的施行,他所憎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在全国的激烈开展等等。在进步文坛内部则不断兴起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导致林对当时形势作出“世道日微,人心日危”^[17]这样消极的估量。对此,林并非真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无心隐居,迫成隐士”^[18]，“颇想在人世上做点事业”^[19]，“以贡献于社会国家”^[20]。就是说,他要做的是面对这些矛盾的纠缠,深思苦索,谋求应对方策。对于这些矛盾(特别是政治上的)的认识,他无意明文表述,但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以下简称《舆论史》)一书中,已有不少抒发。《论语》的出版,将其所认定的“应对方策”公之于世,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条件。

《论语》是林语堂新事业的开篇之作,他声称所谈论的既有“国家大事”,也及“男女私情”(据“《论语》编辑后记”),不拘一格。其初评论政治时事的文稿还较多,林自己也写有积极意义的“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文。这自然也是该刊的关注所在,但并非办刊的宗旨。该刊的主旨是倡导意态闲适、行文幽默的文体,以纠正流行于左翼文坛的那种泛政治化、丧失自身特性的弊端,从而创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后来称之

为“论语派”），以影响社会。这样的主旨，实质上就决定了其发展方向是脱离现实政治斗争，而且越来越严重。

林语堂在矛盾中为自己所设计的这条新路，对林的适用性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可以从容应对国民党政府日益强化的舆论压制政策，驰骋文界，遇险不惊，这是最关键的。二是办刊主旨虽然疏离现实政治斗争，却闯入当时主流文坛所忌讳的领域，轻言淡述，自抒胸臆，自诩开一代文风，余英时先生则誉之为“在当时也有反潮流的意味”^[21]。该刊当年受到广泛的赏识则是事实。其三，《论语》的那种文体文风，正是林的秉性和情趣所在，在以往的作品中曾有良好的表现，还写过有关“幽默”的文章。现在更可用其所长，大显身手，实现做点事“以贡献于社会国家”的诉求。林语堂在这矛盾的社会中，营造了这样一方安身立命之地，真是“得其所哉”！

《论语》的创办，引起了林语堂在文坛上的派系之争和他与当年老友之间的矛盾，一发难休。起初，林语堂虽已不在鲁迅^[22]主编的刊物上写稿，鲁迅却应邀在《论语》上发表多篇文章。在“《论语》一年”中，鲁迅对该刊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估。一方面讲了不少赞誉之词，另外又尖锐地指出其消极面，批评林所倡导的“幽默”在政治上起了“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23]的作用。这是我所见第一次对该刊方针的指责。在《论语》的第一年中，林语堂在社会上还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活动，如1932年12月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5月，和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邹韬奋等40余人，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左翼作家丁玲、应

修人。林语堂所联合的多为有重要影响的民主派人士，他并不反对共产党，却不愿和共产党人合作，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活动，他对国共之间的党派斗争十分憎恶。

随着林语堂政治上日渐消沉，《论语》的消极因素也逐渐滋长。出到第27期后因故交给陶亢德编了。1934年4月他另创《人间世》，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其脱离现实斗争的程度，比《论语》走得更远了。我们说“论语派”三刊，除了上述两刊外，还有创刊于1935年9月16日的《宇宙风》。三刊风格自有一致之处，但时势情况不同，表现亦有所区别。重要的是林所着力经营的不在此刊，其时他所关注的方面正多。三刊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间世》，它所存在的一年零八个月间，林语堂的那些矛盾发展到了高峰期。

《人间世》创刊的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于最为黑暗的年代”^[24]。林语堂《舆论史》猛烈抨击的国民党猖狂压制舆论的事迹，主要出现于这一时期，它曾以生动事例，揭示该政府践踏法纪的程度，已大大超过北洋政府^[25]。书中还披露当时大捕政治犯的风潮，说“自1934年11月到1935年3月，仅北平和天津两地，就关押了230多名政治犯”，“1934年两市逮捕的政治犯超过800人”^[26]。激愤之情，洋溢纸端。这与《人间世》那种闲适的笔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人间世》是当时时局矛盾的产物，它的创办又推动了这些矛盾，鲁迅对它的批评，较之《论语》，提高了档次，他说：“《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也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鸦片相同也”^[27]，把它看成毒害人民的麻醉品了。起初，鲁迅对《人间世》还有所期待，创刊

时鲁迅还介绍几位作者为它写稿，以期对该刊施加影响，条件是“除非执笔人同意，编辑不能任意删改”。后来这一约定被林语堂破坏，也就不再去写稿了^[28]。再往后，矛盾又有新的发展。《人间世》公开发表林语堂攻击左翼作家的文章，如“游杭再记”、“我不敢游杭”、“方巾气研究”等。左翼文界起而与之对阵，较为活跃的是《太白》和《芒种》两刊。《太白》的主要任务，被称为“是转移《论语》和《人间世》所造成的颓废的个人主义的小品文作风”^[29]。《芒种》则被鲁迅直称为“是反对林语堂的刊物”^[30]。《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也常发表左翼文人批林的文章。双方的对立关系，跃入一个新的阶段。就在这期间，鲁迅断绝了和林语堂的联系。上面所说的矛盾高峰期，就是这样降临的。

有谁知道林语堂心灵上还有矛盾在默默地发展呢?! 他对国民党摧残舆论的专制统治的仇愤，越来越强，却在文化工作中不断压抑这种仇愤的对外宣泄。1935年，矛盾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这就是《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的编写。

依据各方意见和林语堂的自我表白，可以断言，这些矛盾的总根源在于，在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下，林语堂无意挺身面对，而是回避迫害，为自己的事业营造一个安全港。与林语堂同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史沫特莱批评林语堂说，“他贪生怕死，不敢挺身而出投入革命斗争”^[31]。“贪生怕死”一词似乎重了点，但批评他“不敢挺身而出投入革命斗争”，是很恰当的（这里还是把他当做同一阵线的伙伴看待的）。当年曾参加林语堂创办的《宇宙风》半月刊工作的周劭回忆说，国民党政府实施白色恐怖，“杨杏佛、史量才相继被暗杀，林语堂也害怕受祸，只好退居

第二线”^[32]。说他“害怕受祸”，可说是一语中的，不愧是同舟共处的知心人。1935年，林在《四十自叙》中称：“胆小只评前年事，才疏偏学说胡卢。”公开讲自己“胆小”，虽带有自嘲的味道，实已表露出自己的心声了。他在《舆论史》一书中，常为古代那些身处官场逆境，只求自保的士人辩解。说他们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只求自保；但因为是人，所以他们的玩世不恭，只不过是掩盖内心的痛苦罢了。”又称：“理解万岁——在没有宪法保护的情况下，仅仅对士人和批评家说一句‘不要怕，奋勇向前’，他们是不会对政治取积极态度的，没有人会拿生命危险去冒犯统治者的。”^[33]讲的是古人，实际上是自己心态的表述。

林著出版后在国内的反响

在1936年8月林语堂赴美之当年，本书在上海由英商凯利和威尔士有限公司（别发洋行）出版。同年在美国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这部著作曾“对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在50年代前后还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今天不少人谈中国的‘公共空间’问题，此书仍有可借鉴之处。”^[34]可是，在国内，本书却长期沉寂无闻。1976年以前，在大陆所出书刊文稿中，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名字^[35]。起初的缘由，当和那时政治大局的转折有关。本书出版不久，国共联合抗日的趋向日益显露，反对国民党专制的舆论已在淡化了，其后原因要复杂些，“左”的思想观念当是其中一条。

本书对国内之关联与影响，主要在中国文学史界和中国新闻史（传媒

史)界,情况有很大差异,分述于下:

一、在中国文学史界

本书写的虽然不是中国文学史,但内容时有涉及,特别是对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等“论语派”和左翼文坛矛盾斗争之解读,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不是其他史料所可代替的。其实际意义,还超过两派斗争的范围。

我特别想了解这本书出版后当年上海文化界的反映,可是据我所查阅的各种史料,还未发现有谁提起过本书。在上海,曾和林语堂一起活跃于沪上文坛的,现只有夏征农老人了。我曾呈写一信(由复旦大学党委派人递送)请教夏老。因他年事已高,未有回音,现住华东医院,未敢再打扰。据丁淦林教授告知,他曾查阅《夏征农文集》(五卷),未见提及《舆论史》这本书。在林语堂本人的文稿中,也没有看到记有我国文化人士谈论本书的文字,只见有他揭露国民党政府情报司头目,发现这本书后对他提出的警告^[36]。我也请教过一些学者,也是一无所知。就是说,这本书所潜藏的、帮助我们理解林语堂和当时左翼文坛矛盾的那些积极因素,尚未展现出来。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我国不少学者对林语堂当年和左翼文坛的矛盾斗争的性质作了不同程度的扭曲。这一矛盾本属革命阵营中文学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表现^[37]。1936年秋,林语堂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巴金、郑振铎等二十一人联合署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

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38]，其同属一个阵营的性质就更明确了。可是我们的文化界却长期将这一矛盾认定为敌我性质。

最为露骨的，是1955年出版的丁易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书。该著一开头就明白把论语派文学标明为反动文学。称林语堂为“投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当帮闲的清客”，说林提倡幽默和闲适的目的，“不外是企图使大家对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不闻不问，而收得巩固反动统治的效果”。1956年由马列学院（中共高级党校）新闻班编的《中国报刊史》（草稿）^[39]，也将林和左翼文坛的矛盾写成敌我矛盾，它虽然对《论语》创刊初期的一些积极表现作了肯定，可是在总结时却写道：“林语堂这时公开谩骂革命，诋毁左联，终于暴露出一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帮闲真面目。”1980年8月出版的《民国人物传》（二）中《林语堂》一稿^[40]，继续将林语堂推向反动阵营，称他“不敢正视现实，企图逃避、躲藏，终于走上反人民的道路”。后来“彻底暴露了……帮闲、帮凶的面目”。

尤为令人感触的，是我所敬仰的、当年曾参加左翼文坛斗争的陈望道、胡愈之二老。陈望道称，他主编《太白》的一项任务，就是“反对林语堂之流配合国民党反动文化‘围剿’而主办的《论语》和《人间世》鼓吹所谓‘幽默’的小品文的”（写于1926年9月）^[41]。胡愈之则说：“《太白》对于胡适、林语堂之流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打击。”（写于1929年7月13日）^[42]

我想，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某些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评判，不足为怪。可是，这些严肃的学者，如果读了这部全力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舆论专制政策的《舆论史》以

后，仍然把林语堂看做国民党政府的帮凶，像这样的荒唐事我从未见过，实际上也不会出现。上面那些情况的出现，就是我所感受到的《舆论史》在我国文学界未能流通，所带来的一大憾事。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那种由“左”的思潮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已经逐渐消除，出现了一些评析切实、富有创见的作品。我深受启发的是吴中杰教授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43]一书中，对“论语派与性灵文学”的论述，既广且深，新意纷呈。因本文题旨所限，这里不能畅谈。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吴教授在对论语派评估问题上的历史性突破。一方面，对这股思潮在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的表现，作出了深切动情的批评。一方面，又勇于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肯定它具有反封建主义、反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积极性，认为“强调自我，讲究性灵，自有其合理的一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新见解。这种新见解之提出，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推动下，学者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所形成的，和是否读过这部《舆论史》并无关联。

但我又想，如果这位学者同时也读过这部著作，是否会有新的领会？回答是肯定的。比如，像文体、文风这种热门问题，《舆论史》中有多处解说，有些是直接阐释论语派倡导的概念，读后自会获得新的感受。书中讲得更多、并特别强调的，是端正新闻报道的文风。提出新闻报道要贴近人的内心和生计、要有人情味、要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喜闻乐见、要用脚写作（指实地采访）等等。这和论语派强调自我、讲究性灵的主张，大异其趣。书中又提出，新闻报道文风文体之改革，“必须从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全面解放入手”，把二者又联系起来，这为我们的文学界开辟了